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再探東亞國際關係：東亞高峰會的制度理論分析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5-2414-H-343-001-
執行期間：95年08月01日至97年01月15日
執行單位：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孫國祥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游明蒼、趙以凡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7年01月15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再探東亞國際關係：東亞高峰會的制度理論分析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5-2414-H-343-001-

執行期間：95年8月1日至97年1月15日

計畫主持人：孫國祥

計畫參與人員：游明蒼、趙以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精簡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五日

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本計畫透過對「東亞高峰會」的檢驗，以探討區域制度主義在東亞的實踐。十六國領導人參加的東亞高峰會論壇，最終目標是形成東亞共同體（即制度）。研究顯示，在東亞（包括亞太）區域的制度展現有限的效力。諸如東協、亞太經合會以及東亞高峰會的組織中，亞洲成員國堅決認為該等制度不能侵犯它們的主權權利。支撐該等組織的基本規範、規則、結構和實踐也反映出對主權的關注。一些因素說明東亞區域不太願意創立有效的多邊的制度，單一最重要的因素是大多數東亞國家關注國內政治的合法性。透過阿拉格帕（Muthiah Alagappa）和阿約伯（Mohammed Ayoob）的著作為基礎，本計畫認為東亞的大多數國家仍在國家內部致力於超越不同的種族、宗教和政治團體，創立凝聚國民的進程。該等國家不願意對任何外部的行為者妥協它們的主權。區域面對多邊制度的態度是它們應該透過提高它們成員的主權，以協助國家建構的進程。東亞國家認識到藉由創立有效的區域制度以及在制度中的合作，它們能最好的管理全球化和保護它們的主權。然而，它們創設該等結構的能力，受到它們國內政治合法性的集體不確定性而有所妥協。各國或許首要是真正成為合法性的主權實體，它們方能成功地參加區域制度的建立。

關鍵字：東亞高峰會、東亞共同體、東協、區域制度主義、國家主權

英文摘要及關鍵詞(keywords)

This project tests the explanatory capacities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by examining the East Asia Summit (EAS). The ultimate goal of EAS is to form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Reg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East Asia (Asia Pacific) have been of limited efficacy. Asian members of organizations such as ASEAN, APEC and EAS have insisted that these institutions not infringe upon their sovereign rights. The basic norms, rules, structures and practices supporting these organizations reflect this concern. A number of factors explain this regional reluctance to create effective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s the concern of most East Asian states with domestic political legitimacy. Drawing on the work of Muthiah Alagappa and Mohammed Ayoob, this project argues that most of the states of East Asia remain engaged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coherent nations out of the disparate ethnic,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groups within the state. These states are reluctant to compromise their sovereignty to any outside actors. The regional attitude towards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is that they should assist in the state building process by enhancing the sovereignty of their members. East Asian states recognize that they can best manage globalization and protect their sovereignty by creating and cooperating within effective regional institutions. However, their ability to create such structures is compromised by their collective uncertainty about their domestic political legitimacy. States may first need to be legitimate, sovereign

entities before they can successfully participate in regional institution.

Keywords: East Asia Summit, East Asian Community, ASEAN, Regional institutionalism, state sovereignty

報告內容

壹、前言

在後冷戰時期，東亞地區經歷了經濟和政治的不確定性和動盪。該等事件導致了東亞國家需要新的制度結構，以管理區域的衝突和經濟關係。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藉由強化自身的制度結構，以回應該等要求，¹其擴大了成員數目及其活動的範圍，包括創立東協區域論壇（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以處理安全關注。²亞洲的國家大幅度增進能提升地區經濟整合的制度，即亞太經合會（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論壇。³1997年至1999年亞洲經濟危機之後，該等制度顯示出效果不彰。2005年12月12日，首屆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在吉隆坡召開，2007年11月22日，第13屆東協領袖會議（13th ASEAN Summit）簽署了《東協憲章》（ASEAN Charter）。然而，東亞國家無法在區域組織應採取何等形式，以及他們應該有如何的效力達成一致。⁴

本文檢驗東亞國家對區域制度的關係，並以東亞高峰會為例思考該類關係如何受到一個「全球化進行中」世界經濟的影響。東亞國家幾乎一致地拒絕區域的制度需要一個國家主權的「共享」（pooling）的構想。反之，它們相信區域的制度應增進它們成員國的主權。⁵對大多數東亞國家而言，該戰略反映自身制度的薄弱。因為大多數該等國家是相對的「弱勢」（weak）國家，即它們從自身的國民享有有限的合法性。儘管大多數東亞峰會的成員國在不同程度上在它們的國境之中具有能力，以控制社會、政治和軍事權力的手段，但它們通常需要依賴該等槓桿以控制社會的反抗部分。⁶

¹ 東協包含所有該等自我界定為「東南亞」的國家。包括汶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越南。

² Shaun Narine, "ASEAN and the ARF: The Limits of the 'ASEAN Way'," *Asian Survey*, Vol.37, No. 10 (October 1997), pp.961-978; Michael Leife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delphi Paper*, No. 302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July 1996; Amitav Acharya, "ASEAN and Asia Pacific Multilateralism: Managing Regional Security," in Amitav Acharya and Richard Stubbs, eds., *New Challenges for ASEAN: Emerging Policy Issue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5), pp.182-202; Malcolm Chalmers, "ASEA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Continuity and Change after the Cold War,"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18, No.1 (April 1997), pp.36-56.

³ Andrew MacIntyre,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PEC,"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 Garry Rodan, Kevin Hewison and Richard Robison, e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25-247; Donald Hellman and Kenneth B. Pyle, eds., *From APEC to Xanadu* (Armonk: M.E. Sharpe, 1997).

⁴ 該等議題的一些討論可參見 Koro Bessho, *Identities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Adelphi Paper No. 325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March 1999).

⁵ Richard Higgott, "De Facto and De Jure Regionalism: The Double Discourse of Region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 *Global Society*, Vol.11, no. 2 (1997), p.177.

⁶ Joel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Migdal, "Why Do So Many States Stay Intact?," in Peter Dauvergne, ed., *Weak and Strong States in*

作為弱勢國家，東亞國家對主權的考慮幾乎優於所有其他議題之上。他們不願意犧牲主權的任何面向，同時它們對於自身行使主權控制的能力是信心缺乏。如此集中於主權是一種較深刻關心的表現：東亞國家被糾纏在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的進程，即超越不同種族、宗教和語言共同體產生全國性的認同。長期以來各國仍屬脆弱，它們對創立強大的區域制度的結構是非常有限的意願和能力。儘管在一個全球而且逐漸易變的世界經濟，東亞峰會成員國或許最好能藉由參加區域的制度的服務，其中它們能共享政治和經濟資源。然而，在該等更大結構需要的功能並沒有創造如此為之的能力。全球化或許對亞太國家造成壓力，因為它們沒有回應的能力。⁷該分析對東亞國家致力於創設強健的制度結構有強大的意涵。儘管國家弱勢不是促成東亞區域制度能力不足的唯一因素，但的確是一項主要的肇因要素，但卻是屢次被忽略的要素。

貳、研究目的

本計畫之名稱為「再探東亞國際關係：東亞高峰會的制度理論分析」，嘗試探究在建立東亞高峰會的過程中，實際的歷史發展與回顧，東亞國家如何透過所謂「東亞高峰會」以對應區域化、全球化以及未來可能共同體的建立。新制度主義者強調，制度的建立通常有「領導角色」國家的存在，方能成功建立。然而，原先由中國主導的東亞高峰會，首屆會議似乎確立「東協領導模式」，該類由相對弱國集體領導的方式並不常見，對制度理論的解釋有無歧異？東協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似乎已被周邊國家所認可，而東協國家也掌握參加該組織的主動權。《東協憲章》無疑又強化東協作為一個整體的作用。

本計畫探討東亞區域制度主義本質有關文獻的辯論。亞洲人集中於共識建立（consensus-building）、無對抗性（non-confrontational）和無約束力（non-binding）的結構是否反映一種對制度不同的亞洲文化途徑？亞洲的制度是否應在西方世界發展的制度的結構進行不同的評估？⁸或是爭辯有關亞洲制度的特色性質實際上是企圖合理化該等制度與生俱來的限制？本計畫認為亞洲的制度是與生俱來的脆弱。它們追隨的進程是亞洲國家對共同、一致的利益取得一致意見的無能象徵。該等進程有助於消除區域關係的障礙，但它們對重新定義國家利益貢獻甚微。⁹東亞高峰會的制度建立對我國提出何種生存與發展的挑戰，可否轉為對台

Asia-Pacific Societies (Canberra, Allen and Unwin, 1998), pp.11-37.

⁷ For a 更詳細的討論 of the importance of sovereign considerations to 開發中世界國家，參見：Mohammed Ayoub, "Subaltern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eets the Third Worl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 Stephanie G. Neuman, ed., (Houndsmills, Macmillan Press, 1998), pp.31-54; Mohammed Ayoub, *The Third World Security Predicament*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5).

⁸ James Ferguson, "New Forms of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Governance: From 'Codes of Conduct' to 'Greater East Asia,'" in Andrew Tan and Kenneth Boutin, e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elect Publishing, 2001), pp.122-165.

⁹ 參見 Amitav Acharya,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10, No.3 (1997), pp.319-346; Miles Kahler, "Legalization As Strategy: The Asia-Pacific Ca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3 (Summer 2000), pp.549-571.

灣的機會與助力，台灣如何因應被「東亞高峰會」成員包圍的最新制度建立，最後試圖探討台灣如何回應與制定相關的外交政策。

參、文獻探討

由於東亞高峰會於 2005 年 12 月始召開，因此，本計畫具有高度的新穎性，但相對而言，國內外對此議題的學術文獻並不多，主要為學者以及記者的新聞評論稿，尚未有完整與詳實的論述。因此，基於本計畫係以「制度理論」探討東亞高峰會的制度形成與演變，因此，首先對既有相關理論的文獻進行論述。

一、制度主義的研究發展

近年來，不同類型的制度主義圍繞在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之間流動。就某種程度而言，「國際制度主義」(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可以置於屬於政治科學本身的制度理論綱要之中。然而，國際關係學界的制度主義研究者可以從國內制度的研究獲取靈感。因為國關學界對制度會提出類似於國內制度的問題，並且可以採用制度主義理論相同的分類標準。如同政治科學一般，不同類型制度主義之間的邊界或許在國關學界也難以明顯的區隔或窮盡。尤有進者，在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的交叉處，反而顯現一些當前最為適切和大有可為的研究領域。

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兩者對制度研究的主要區別在於，國際制度的研究並非依賴一個長時期相同傳統的甦醒，或回到舊有的根源，而是某種程度上受到政治科學中「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 發展的啟發。可以確定的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關係學界的發展，包括國際政治學中首位教授職位的創建，當時關注的焦點在法律主義 (legalism)、正式的結構以及政治科學中「舊制度主義」(old institutionalism) 普遍對規範的傾向。當時嶄新的全球制度，即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自然是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而且學者基於國際法的驅使，希望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個堅固的國際框架。雖然該傳統或許可標示為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中的「首次一致」(first consensus)，但其似乎並未為其後的理論化和研究，奠立重要穩固的基礎，或是對理論化和研究有任何深遠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現實主義優勢典範的陰影下，專門研究國際組織學者的存在遭受邊緣化。然而，對制度的研究而言，他們的著作具有描述和實用的價值傾向，儘管並非理論驅使或促成制度理論的發展。另外，國際組織和組織理論的研究之間則是彼此忽視。國際組織的教科書並未提及組織理論，組織理論的教科書亦未涵蓋任何國際組織的系統性論述。雖然國際組織的研究基本上是描述 (atheoretical) 性質，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國際組織的文獻中仍出現重要的洞視。可是其與晚近出現的「新制度主義」並沒有多少的連貫性。1947 年創刊的《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期刊，可勉強代表一種國際制度研究的延續性平臺，因其作為聯合國家族和其他國際機構研究者的論壇，1970 年代，《國際組織》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發表園地。晚近，其更成為國際關係「制度主義者回歸」(institutionalist turn) 的主要平臺之一，並與國際政治經濟研究領域有密切的關聯。

因此，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理想主義（idealism）和第二次大戰後對國際組織的研究，似乎代表國際關係中的「舊制度主義」。由於學術累積較為分散，從而對「新制度主義」的啟發較無連貫性。「新」、「舊」制度主義的主要差別在於，當代的學者較他們的前輩，採取一種更為廣泛的觀點探究「制度」。舉例而言，楊（Oran Young）界定制度為「由易於確認的角色所構成的社會實踐，結合管理該等角色佔有者（occupants）之間關係的一群規則或慣例。」該等制度不一定涉及組織，組織則被理解為有形的（material）實體，具有物質的（physical）位置（或所在地）、辦公處所、人員、配備和預算等。根據渠劃分的方式，市場是一種制度，廠商則是一種組織；婚姻是一種制度，家庭係其組織的表現形式。因此，主權是一種制度，而國家是一種組織。不過，該類區別並非總是獲得學界的確認，從而「制度」和「組織」經常被交替的使用。雖然楊的概念化或許並未被普遍的接受，但其對當代的制度分析提供進一步的說明，亦即不受限於正式的國際組織框架中。

由於在國際關係自身領域憑藉的相對缺乏，一些國際關係學者已「回到國內政治的模式，以啟發新的問題和途徑研究國際制度」。1970年代初期，國際政治舞臺的發展和事件似乎是促使「制度主義者回歸」的重要轉折時期，因為兩次石油危機暴露出主要強權的脆弱性，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對干擾世界經濟展現出明確的權力。同時，曾對全球金融關係提供可預測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制度，亦遭受破壞。因此，一旦互賴（interdependence）所引發的問題出現，其後可能導致對制度的需求和興趣。

然而，國際制度理論的靈感並非完全來自國際關係領域自身的專業，主要是來自外部的經濟學和政治科學，此時國際政治學成為「其他學科許多知識潮流的受益者和受害者」，意味可以認同一項由國內和國際制度學者所提出問題的共同核心。關注的問題包括：制度的形成，諸如何以擁有主權、利己的國家為何同意建立國際制度（諸如傳統的國際法）；制度的持續和變遷，諸如何以某些國際制度持續存在，而其他的制度被改變或終止存在；制度對個體行為的影響，諸如國際制度是否會影響國家的行為，如果是有影響又如何影響；以及制度的設計，諸如功能的需要或異種同形（isomorphism）的社會過程是否為最佳的解釋？如何協調全球主義、區域主義和部門主義（sectoralism）各自的制度意涵？新制度何以能取代舊制度。該等對制度的問題，可以為「東亞高峰會」重要的檢視工具。為了避免現實主義者的攻擊，國際制度主義者似乎將注意過度集中於制度對個體行為影響的問題，較為忽略其他的問題。「自1980年代以來，絕大部分國際制度的文獻顯示，學者們係為了對現實主義者議程做出回應所需：不斷證明制度對國家行為的影響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理論的散播模式也顯示，國內政治制度主義的不同變化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取向。本計畫引用霍爾（Peter A. Hall）和泰勒（Rosemary C.R. Taylor）的分類，區別出歷史制度主義、理性抉擇制度主義以及社會制度主義的

案例，以及在國際制度的研究中不時出現的結合體。

二、有關東亞區域主義演進的一般論述專書與期刊

由於本研究計畫研究的「東亞高峰會」與東亞共同體創建息息相關，因此亦可由相關文獻探討，尤其是過程中重要成員國的角色，尤其是中國和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參考文獻亦包括「東亞共同體形成之過程」以及「區域中國家的角色扮演（尤其是中國和日本）」為主要參考文獻對象。因此，主要相關的參考文獻可歸納為三大類。

其次，有關東亞共同體的演進與展望，相關研究成果也十分豐富，對於本計畫的執行有非常高度的助益。然而，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中，應該探求某種外部因素如何逐漸維內部之因素，在相對而言較為快速的過程中，主要的動能究竟為何？政治與經濟的互動如何？制度如何被建立？該等議題皆為本計畫從中汲取以及探討之對象。

最後，關於東亞區域內國家以及外部（尤其是美國）對某種「東亞共同體」的外交作為以及決策制定乃本計畫最重要的文獻探討，其中主要將歸納、整理以及訪談日本和中國如何改變傳統的經濟外交途徑，即基本上由多邊外交走向雙邊經濟外交，其中國際制度在國際和國內政策所產生的影響。

總之，本計畫相關的文獻十分豐富，尚有許多重要的官方資料。唯其中並非全然直接與本計畫相關，因此，本計畫必須從所有相關的文獻中抽絲剝繭，進行重要的梳理，以探求與本計畫方向需求之資料。此外，各國官方推動區域整合的觀點與新的想法，亦為本計畫重要的關注焦點。

肆、研究方法

本計畫主題為「再探東亞國際關係：東亞高峰會的制度理論分析」屬於新制度主義理論研究的一部分，在研究的方法上，本計畫試圖藉由國際制度研究中的三項重要取向，亦即「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理性抉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以及「社會制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遵循新制度主義理論研究中的一般規律，吸收既有研究中有用的分析工具，又希冀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和發展。對新制度主義在東亞高峰會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特徵進行判斷和解釋，並且在梳理對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的許多模糊認識的同時，試圖為東亞高峰會的跨學科理論整合，提出一個更加可行的方向和研究議程 (agenda)。

「中層分析」的制度理論對本計畫而言，其主要意義在於為本研究提供在方法論上非常重要的分析框架或分析途徑，其有助於本計畫突破一些傳統的學術禁區，拓寬學術的視野，更準確地認識錯綜複雜的東亞國際關係中的事實真相，並希望及時預見潛在的事實。另外，本計畫將以「文獻分析法」為主、「深入訪談法」為輔，根據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歸納梳理，再從實際的東亞高峰會成員國外交層面，分析東亞國家是如何在新制度主義下進行東亞高峰會建立的互動模式。採用文獻分析法的原因在於其符合成本效益分析法 (cost-benefit

analysis)，亦即以最低的成本盡可能獲取第一手的資訊，經由主持人的「深入訪談法」求證後，再透過歸納、整理、轉化成為研究成果。

伍、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發現，針對東亞高峰會的重要性以及其與先前區域論壇的不同之處是許多學者專家與文獻所回應的主要議題。畢竟，我們已經見證了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南亞區域合作協會（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環孟加拉灣多部門技術與經濟合作倡議（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IMSTEC）、環印度洋區域合作協會（Indian Ocean Rim-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OR-ARC）。相較而言，東亞高峰會的特別和不同之處在於：首先，東亞高峰會是一種區域間（inter-regional）的論壇，結合了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以及澳大拉西亞（Australasia）；其次，東亞高峰會是首個亞洲的集團，其包括所有主要的亞洲強權；以及最後，東亞高峰會乃基於開放和包容的（inclusive）區域主義。

本計畫認為，由於東亞國家多屬薄弱，從而要求各國集中於國家建構的進程。如此聚焦的結果之一是各國強調主權的重要性，並且將區域的制度理解作為主權增進的機制。本計畫並非論證東亞國家在創設強健區域制度時，面對國家弱勢而浮現困難是唯一解釋推論的變項。即令東亞國家皆為強勢，對擴大區域制度的其他障礙，包括戰略和歷史的猜疑、美國在東亞高峰會的角色、東亞共同體感情的缺乏仍將持續成為障礙。然而，本計畫認為若如此多的東亞國家並沒有全神貫注於國家建構進程，東亞國家對於合作可能將更加不易，遑論擱置它們各種爭論（尤其在外部威脅的影響）。相對弱勢國家之間創立有約束的區域制度並非明智，因為弱勢國家受限於無法具有強大制度相關聯的執行義務和責任的能力。沒有額外的國家建構，弱勢國家無法成功的參加制度建立。由於該等事實，有點鬆散且一致取向的（consensus-oriented）區域制度，其在東亞逐步形成是為了適應它們的環境。然而，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進程中，它們被證明仍無法勝任。

東亞高峰會的一些國家處於一種困難的境地。如果它們希望保有一種明確維護主權的方法，全球化的邏輯和經濟危機的經驗，似乎迫使各國在一種更大的結構中共同努力。然而，成功的合作首先需要一個相當程度的主權控制和統一的國家認同，許多東亞國家仍正試圖進行創立當中。作為一個強勢國家成為在新興的國際環境中建立一個成功區域制度基礎的必要條件。因此，對台灣而言，在區域政治環境對我限制的前提下，以及東亞區域制度發展受到各國主權能力的限制下，我國仍有努力的時間與空間，亦即將國內的制度盡可能達到善治的標準，從而為我國參與東亞區域整合進程做好準備。

陸、參考文獻

- Acharya, Amitav (1995) "ASEAN and Asia Pacific Multilateralism: Managing Regional Security," in Amitav Acharya and Richard Stubbs (eds) *New Challenges for ASEAN: Emerging Policy Issue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pp. 182-202.
- (2001)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 (2000) "Globalisation,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e in Asi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41st ISA Convention, 14-18 March, Los Angeles, California: 1-2.
- (1997)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10, (3): 319-346.
- (2003) "Regional Institutions an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10-240.
- Aggarwal, Vinod and Charles Morrison (eds) *Asia Pacific Crossroads: Regime Creation and the Future of APEC*,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Anwar, Dewi Fortuna (2001) "Insurgencies and Communal Conflicts: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in Indonesia's Plural Societies", in Andrew T. H. Tan and Kenneth Boutin (ed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elect Publishing, pp. 349-376.
- Alagappa, Muthiah (1995) "The Anatomy of Legitimacy", in Muthiah Alagappa (e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1-30.
- (1995) "The Bases of Legitimacy", in Muthiah Alagappa (e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1-53.
- (2003) "Constructing Security Order in Asia: Conceptions and Issues",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70-105.
- (1995) "Contestation and Crisis", in Muthiah Alagappa (e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54-65.
- (1995) "Introduction" in Muthiah Alagappa (e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8.
- Ariff, Mohammed (2001) "Trade, Investment, and Interdependence", in Simon S. C. Tay, Jesus P. Estanislao, and Hadi Soesastro (eds) *Reinventing ASEAN*, Singapore: ISEAS, pp. 45-66.
- Ayoob, Mohammed (2002) "Inequality and Theoriz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ase for Subaltern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 (3): 27-48.
- (1998) "Subaltern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eets the Third

- World”, in Stephanie G. Neuman,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 Houndsmills: Macmillan Press, pp. 31-54.
- (1995) *The Third World Security Predicament*, Boulder: Lynne Rienner.
- Barnett, Michael (2002) “Radical Chic? Subaltern Realism: A Rejoin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 (3): 49-62.
- Bartelson, Jens (1995)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eson, Mark (1999) “Reshaping Regional Institutions: APEC and the IMF in 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12(1): 1-24.
- Bessho, Koro (1999) Identities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Adelphi Paper* No. 325,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March.
- Biersteker, Thomas J. and Cynthia Weber (199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in Thomas J.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eds) *State Sovereignty as Social Constru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1.
- Brown, David (2002) “Why Might Constructed Nationalist and Ethnic Ideologies Come into Confrontation With Each Other?”, *The Pacific Review* 15 (4): 555-570.
- Buzan, Barry (1991) *People, States and Fear*, Boulder, Lynne Rienner.
- Case, William (1995) “Malaysia: Aspects and Audiences of Legitimacy”, in Muthiah Alagappa (e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9-107.
- Chaipravat, Olarn (2001) “Towards a Regional Financing Arrangement in East Asia”, *The World Economy* 24(8): XXX.
- Chalmers, Malcolm (1997) “ASEA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Continuity and Change after the Cold War”,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18 (1): 36-56.
- Chang Li Lin and Ramkishan S. Rajan (2001)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Monetary Regionalism in Asia”,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18(1): 103-118.
- Clapham, Christopher (1999) “Sovereignty and the Third World State”, in Robert Jackson (ed) *Sovereignty at the Millenniu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pp. 100-115.
- Cliff, Roger (1998) “Taiwan: In the Dragon’s Shadow”,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88-314.
- Collins, Alan (1998) “The Ethnic Security Dilemma: Evidence from Malays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0(3): 261-278.
- Crouch, Harold (1998) “Indonesia’s ‘Strong’ State”, in Peter Dauvergne (ed) *Weak and Strong States in Asia Pacific Societies*, Canberra: Allen and Unwin, pp.93-113.
- Dent, Christopher M. (2001) “Singapor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The Pursuit of

- Economic Secur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3(1): 1-23.
- Doner, Richard F. (1997) “Japan in East Asia: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Leadership”, in Peter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ishi (eds) *Network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97-233.
- Doty, Roxanne Lynn (1996) “Sovereignty and the Nation: Constructing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omas J.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eds) *State Sovereignty as Social Constru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1-147.
- Drucker, Peter F (1998) “In Defense of Japanese Bureaucracy”, *Foreign Affairs* 77(5): 68-80.
- Ferguson, James (2001) “New Forms of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Governance: From ‘Codes of Conduct’ to ‘Greater East Asia’”, in Andrew Tan and Kenneth Boutin (ed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elect Publishing, pp. 122-165.
- Haacke, Jurgen (1999) “The Concept of Flexible Engagement and the Practice of Enhanced Interaction: Intramural Challenges to the ‘ASEAN Way’”, *The Pacific Review* 12(4): 581-611.
- Hamilton-Hart, Natasha (2000) “The Singapore State Revisited”, *The Pacific Review* 13(2): 195-216.
- Hanggi, Heiner (1991) *ASEAN and the ZOPFAN Concep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Harris, Stuart (2000) “Asia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Their Response to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13(3): 495-516;
- Harrison, Henrietta (2001) *Inventing the Nation: China*, London: Arnold Press.
- Hellman, Donald and Kenneth B. Pyle (1997) (eds) *From APEC to Xanadu*, Armonk: M.E. Sharpe.
- Hemmer, Christoph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2002)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 (3): 575-607.
- Higgott, Richard (1997) “De Facto and De Jure Regionalism: The Double Discourse of Region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 *Global Society* 11(2): 165-183.
- Jackson, Richard (2001) “The State and Internal Conflict”,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5(1): 65-81.
- Jackson, Robert (1999) “Sovereignty in World Politics: A Glance At th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 in Robert Jackson (ed) *Sovereignty at the Millenniu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pp. 9-34.
- Jomo, K.S. (1998) (ed) *Tigers in Trouble: Financial Governance, Liberalisation and Crises in East Asia* New York: Zed Books Ltd.

- Kahler, Miles (2000) "Legalization as Strategy: The Asia-Pacific Ca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 (3): 549-571.
- Kato, Kazo (2000) "Open Regionalism and Japan's Systemic Vulnerability", in Peter Katzenstein (ed) *Asian Regionalism*, Ithaca: Cornell East Asia Series, pp. 35-88.
- Katzenstein, Peter (1997) "Introduction: Asia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eter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44.
- Khong, Cho-Oon (1995) "Singapore: Political Legitimacy Through Managing Conformity", in Muthiah Alagappa (e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8-135.
- Krasner, Stephen D. (1999)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1) "Problematic Sovereignty",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Problematic Sovereign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23.
- Krauss, Ellis S. (2000) "Japan, the US, and the Emergence of Multilateralism in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13 (3): 473-494.
- Lawson, Stephanie (1998) "Confucius in Singapore: Culture, Politics, and the PAP State", in Peter Dauvergne (ed) *Weak and Strong States in Asia Pacific Societies*, Canberra: Allen and Unwin, pp. 114-134.
- Leifer, Michael (1996)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delphi Paper* No. 302,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July.
- (2000a) *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 Coping With Vulnerability*, London: Routledge.
- (2000b) "The Changing Temper of Indonesian Nationalism", in Michael Leifer (ed) *Asian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pp. 153-169.
- Ling, Ooi Giok (2001) "Governance in Plural Societies and Security: Management of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in Andrew T. H. Tan and Kenneth Boutin (ed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elect Publishing, pp. 288-317.
- MacDonald, Scott B. and Jonathan Lemco, "Indonesia: Living Dangerously", *Current History* 100(645): 176-182.
- MacIntyre, Andrew (1997)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PEC",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 Garry Rodan, Kevin Hewison and Richard Robison, (e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5-247.
- Mattli, Walter (2000) "Sovereignty Bargain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2): 149-180.
- McKenna, Tom (2002) "Saints, Scholars and the Idealized Past in Philippine Muslim Separatism", *The Pacific Review* 15 (4): 539-553.

- Migdal, Joel (1988)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hy Do So Many States Stay Intact?”, in Peter Dauvergne (ed) *Weak and Strong States in Asia-Pacific Societies*, Canberra: Allen and Unwin: 11-37.
- Moon, Chung-In (1998) “South Korea: Recasting Security Paradigms,”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64-287.
- and Chaesung Chun (2003) “Sovereignty: Dominance of the Westphalian Concept and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ecurity”,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6-137.
- Morada, Noel M. and Christopher Collier (1998) “The Philippines: State Versus Society?”,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549-578.
- Mutalib, Hussin (2000) “Il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Opposition in Singapore”, *Third World Quarterly* 21(2): 313-342.
- Narine, Shaun (1997) “ASEAN and the ARF: The Limits of the ‘ASEAN Way’”, *Asian Survey* 37, no. 10 (October 1997): 961-978.
- (2001) “ASEAN and the Idea of an ‘Asian Monetary Fund’: Institutional Uncertainty in the Asia Pacific”, in Andrew Tan and Kenneth Boutin (ed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elect Publishing, pp. 227-256.
- (1998) “ASEAN and the Management of Regional Security”, *Pacific Affairs* 71(2): 195-214.
- (2002) “ASEAN in the Aftermath: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Crisis”, *Global Governance* 8: 179-194.
- (2002) *Explaining ASEAN: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Boulder: Lynne Rienner.
- (2003) “The Idea of an ‘Asian Monetary Fund’: The Problem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 *Asian Perspective*, 27(2): 65-103.
- (2002c) “The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State Sovereignty and Communities of Identity and State Sovereignt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n Helen Lansdowne, Philip Dearden, and William Neilson (eds)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Challenges and Response*, Victoria: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Initiatives, pp. 253-271.
- Nathan, K.S. (1998) “Malaysia: Reinventing the Nation”,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513-548.
- Ninh, Kim (1998) “Vietnam: Struggle and Cooperation”,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45-476.

- Nischalke, Tobias Ingo (2000) "Insights from ASEAN's 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 The 'ASEAN Way', a Real Spirit or a Phanto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2(1): 89-112.
- Oksenberg, Michel (2001)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in the Asian Historical Context",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Problematic Sovereign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84-104.
- Ong, Aihwa (2000) "Graduated Sovereignty in South-East Asia,"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7:55-75.
- Putzel, James (2000) "Social Capital and the Imagined Community: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 in the Philippines", in Michael Leifer (ed) *Asian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pp. 170-186.
- Rajah, Anand (2002) "A 'Nation of Intent' in Burma: Karen Ethno-Nationalism, Nationalism and Narrations of Nation", *The Pacific Review* 15(4): 517-537.
- Ramcharan, Robin (2000) "ASEAN and Non-interference: A Principle Maintained",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2 (1):60-88.
- Rapkin, David P. (2001)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Power to Block: the APEC and AMF Cases", *The Pacific Review* 14(3): 373-410.
- Ravenhill, John (2000) "APEC Adrift: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13 (2): 319-333.
- (1999) "APEC and the WTO: Which Way Forward for Trade Liberaliz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1(2): 220-237.
- Satip Sukatipan (1995) "Thailand: The Evolution of Legitimacy", in Muthiah Alagappa (e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93-223.
- Segal, Gerald (1994) *China Changes Shape: Reg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delphi Paper* No. 287, Lond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March.
- (1999)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4-36.
- Sharma, Shalendra D. (1998) "Asia's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IMF", *Survival* 40(2): 27-52.
- Singh, Bhubinder (2002) "ASEAN's Perceptions of Jap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Asian Survey* 42 (2): 276-296.
- Stubbs, Richard (2002) "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42(3): 440-455.
- Tin Maung-Maung Than (1998) "Myanmar: Preoccupation With Regime Survival, National Unity and Stability",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90-416.
- Wang, Fei-Ling (1999) "Self-Image and Strategic Intentions: National Confidence and Political Insecurity", in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 *In the Eyes of*

- the Dragon*, Boulder: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21-46.
- Wang, Jianwei (1999) "Managing Conflict: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 Diplomacy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in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 *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 Boulder: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73-96.
- Webber, Douglas (2001) "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After the Asian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14(3): 339-372.
- Wee, Vivienne (2002) "Ethno-Nationalism in Process: Ethnicity, Atavism and Indigenism in Riau, Indonesia", *The Pacific Review* 15 (4): 497-516.
- Weiss, Meredith (1999) "What Will Become of Reformasi? Ethnicity and Changing Political Norms in Malays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1(3): 424-450.
- Werner, Wouter G. and Japp H. De Wilde (2001) "The Endurance of Sovereignty",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3): 283-313.
- Wesley, Michael (1999) "The Asian Crisis and the Adequacy of Regional Institution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1(1): 54-73.

柒、計畫成果自評

關於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本計畫在執行期間盡量嚴格遵守原來的計畫設計，然而，經過更多且深入的文獻閱讀以及赴新加坡的實地訪談，仍或多或少影響計畫的進度與想法，對區域制度的成功建立有更成熟的看法，致使與原先設計的區域主義研究取向調整至關注東亞國家內部的主權建構。除此之外，本計畫基本達成預期設定的目標，即對有關「東亞高峰會」進行深入的探討並提出自我問題的解答，當然，實地訪談的過程中仍面對一些不同或歧異的意見與觀點，計畫主持人也盡量進行整合，避免在出國訪談心得與成果報告中出現邏輯和論述不一致的情形出現。當然，由於聯繫上的誤差，致使出國訪談行程有所延宕而影響到計畫的執行進程。

基本上，本計畫對於拉近國內學界與實務界對東亞高峰會以及東亞區域整合的理解具有拋磚引玉的研究成果，因此不僅對學術的累積可以提供一定的基礎，而且亦可提供我國對外相關政府單位在擬定相關對外政策的應用參考。當然，根據對本計畫研究成果的修飾，亦適合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

赴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95-2414-H-343-001-
計畫名稱	再探東亞國際關係：東亞高峰會的制度理論分析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孫國祥/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2008年1月3日至1月11日/新加坡
國外研究機構	新加坡國立大學、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新加坡國防與戰略研究所

工作記要：

自2008年1月3日至1月11日，計畫主持人赴新加坡拜訪相關大學與智庫，圍繞「東亞高峰會」專題計畫訪談專家及學者。並於1月8日和9日，參加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EAS)在香格里拉飯店舉辦的成立40周年慶祝晚宴以及常年區域展望論壇。主要針對東亞高峰會、東協發展情形、東亞整合等相關議題訪談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教授(Kripa Sridharan)、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主任(K. Kesavapany)、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Tin Maung Maung Than)等。

研究心得：

以訪談之結果為主軸，佐以相關觀察，彙整訪談研究心得如后：

一、東亞高峰會有其特殊和不同的意義

(一) 東亞高峰會不同於既有的區域論壇

針對東亞高峰會的重要性以及其與先前區域論壇的不同之處是許多學者專家所回應的主要議題。畢竟，我們已經見證了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南亞區域合作協會(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環孟加拉灣多部門技術與經濟合作倡議(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IMSTEC)、環印度洋區域合作協會(Indian Ocean Rim-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OR-ARC)。相較而言，東亞高峰會的特別和不同之處在於：首先，東亞高峰會是一種區域間(inter-regional)的論壇，結合了東

北亞、東南亞、南亞，以及澳大拉西亞 (Australasia)；其次，東亞高峰會是首個亞洲的集團，其包括所有主要的亞洲強權；以及最後，東亞高峰會乃基於開放和包容的 (inclusive) 區域主義。

(二) 新加坡對東亞高峰會的立場

前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曾在亞太圓桌會議 (Asia-Pacific Round Table) 表示，他對東亞高峰會十分樂觀，並認為東亞高峰會成員國能在 2030 年達到目前歐盟的生活水準。他也相信亞洲正在復興並且探尋其自身走向亞洲整合的方式。此類整合必須以市場為基礎，成員國應協助促進該進程。東亞高峰會成員現在已經自主創造它們自己的未來以及亞洲的未來。成員國必須包括在在國內治理和外部關係負擔責任，對外關係尤其在三方面：中日關係；東協整合；以及中印關係。最後，吳作棟強調需要改變心態。

延伸吳作棟的觀點，新加坡學者認為，如同亞太經合會主要目的是在 1990 年代對美國的交流，當其似乎顯現在冷戰後或許將採行孤立主義，而且如同東協區域論壇主要是結合所有強權涉及亞太安全議題的利益，因此，東亞高峰會或許可以成為一個政治框架，致使三個亞洲強權在建立一個亞洲共同體上能和諧的工作。一項重要的目的是促使中國和日本在東亞高峰會的框架中有好地解決它們的分歧。因此，東亞高峰會的角色是為建立一個亞洲共同體的框架，而且它的目的是增進其成員國之間的和諧與合作。

二、對東協內部整合進程觀點歧異

(一) 東協至少需要多半個世紀方能達到歐盟當前的經濟整合程度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在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舉辦的區域論壇上表示，正由於東協與歐盟的背景差得太遠，現在很難拿兩者相提並論。他解釋說，歐盟 27 個成員國擁有共同發展成文明社會、共同接受戰爭洗禮的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反觀東南亞國家卻有著不同的語言和文化背景，彼此之間經常缺乏溝通，經濟發展程度也參差不齊。東南亞若一直是一盤散沙，就永遠無法與東協以外的國家競爭。他表示，「如果你肚子餓了，別人可以喂你，那是達富爾和索馬利亞的情況。但是，如果你想致富，那就沒有人可以幫你，全得靠自己了。」

他引述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資料指出，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和越南 2008 年預料可取得 4.5% 至 8.2% 的經濟增長，與歐美的 1.5% 至 2% 相比，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算是表現不錯。但是，他指出東南亞國家能取得經濟增長，並不意味就能取得經濟整合。他舉歐盟自由通關的特點為例，說明東協為什麼至少要在 50 年以後，方能有望取得像歐盟今天的經濟整合程度。他表示，「以東協創始國而言就好，試想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和汶萊的人民，如果只需一本護照就能自由進出任何國家，那非法移民將會是非常可怕的問題。」

因此，他表示在尋求經濟整合的道路上，東協只能慢步向前，讓成員國有足夠的時間去提升到共同的水準。

（二）新加坡大力支持《東協憲章》

新加坡巡迴大使許通美（Tommy Koh）教授在東南亞研究院所舉辦的區域展望論壇上提出他支持《東協憲章》的八點理由。首先，《東協憲章》將使東協成為更多以法規為依據的（rules-based）組織，依賴網絡關係、商議、相互適應和協調的「東協方式」（ASEAN Way）將不會廢止。其將藉由一種遵守法規的新文化所補充；其次，相較於其他的區域組織，東協作為回應區域挑戰的強大和有效制度的能力有所欠缺，因此，強化東協的制度得以更有效地在面臨諸如 1997 年金融風暴、禽流感等區域危機時發揮效用；其三，其將培養認真承擔責任的文化，確保各成員國領導人履行承諾。在過去，只有大約三成的東協協定獲得落實。東協將設置一個遵守監督系統，而且更重要的是，一個對不服從（non-compliance）強制爭端解決系統將適用在全部的東協協定之中；其四，其將強化東協麻煩的和不協調的組織結構以及它的決策進程。每一個成員國將指派常任代表（Permanent Representative）常駐東協設在雅加達的總部秘書處。各類部長會議的擴散將分組為三個群集，反映東協整合的三根支柱：經濟、安全和社會文化合作；其五，東協秘書處將獲得更多的人力及資金，例如秘書長將有四名副秘書長從旁協助；其六，《東協憲章》將包括強化及深化東協整合的程度，東協遭遇的風險十分高。面對中國和印度的迅速崛起以及它們成長的競爭力，東協必須更快整合為一個 5 億 7,000 萬人口的經濟共同體，以致其能更有效的與兩個經濟巨人競爭；其七，《東協憲章》將確保東協繼續佔有許多區域論壇的駕駛座，諸如東協區域論壇、東協加三以及東亞高峰會；最後，高級別專門小組（High Level Task Force）對《東協憲章》的希望，它的原則和目標將更加以人為本，年輕和年長、菁英和卑微的民眾、公、私和公民社會。因此，2008 年 1 月 7 日，新加坡遞交《東協憲章》正式批准書給設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的東南亞國家協會秘書處，並由新任秘書長蘇林收下，成為東協 10 國中第一個正式批准《東協憲章》的會員國。新加坡希望成為一個「典範國家」（Model Country）。

三、東協及相關制度的展望

（一）東協內部展望仍受制於國家治理能力的缺乏

2008 年 1 月 7 日，前泰國外長蘇林（Surin Pitsuwan）從前任秘書長、新加坡籍的王景榮手中接下新職，成為東協第 12 任秘書長。雖然各界對他的期望很高，但在東協秘書長職位仍處於權力和資源有限的情形下，或許期望是過於不切實際。蘇林也將必須找出應付成員國國內方面政府脆弱的方式，諸如泰國新政府面對不確定的國內政治環境、印尼在 2009 年 7 月的選舉已經啟動，以及一個逐漸被「圍攻」的馬來西亞政府可能要求在提前選舉，提前至 2008

年3月7日至16日。該等政府將對任何進一步經濟整合的潛在成本十分敏感，當它們將關注的焦點放在國內的議題，範圍從燃油的價格、收入不平衡的擴大到種族和宗教的緊張。

對《東協憲章》的批准或許也遭遇一些困難。一些印尼和菲律賓的議員公開批評緬甸人權紀錄的姿態，並且試圖藉由要求拒絕批准《東協憲章》的施壓有可能產生問題。然而，《東協憲章》將在2008年年底批准的希望仍高，並且準備在2008年11月在泰國芭達雅第14屆東協高峰會（ASEAN Summit）舉辦慶祝《憲章》通過的活動；芭達雅是東協在1967年簽署原始聲明的地點，別具歷史意義。

（二）東協外部關係展望仍緩步前進

東協的外部關係也是展望的主要領域。自從在1996年雙方建立了正式的對話關係，東協與中國的關係已經十分密切。雙方有可能在2008年完成東協與中國自由貿易協定的最後重要的部分，亦即有關服務貿易的完成。東協將持續歡迎中國持續經濟發展所帶來中國在投資、貿易和觀光客領域的增長。然而，與此同時，對廉價中國進口和對資源和市場競爭的擔心也可能持續。

在安全方面，中國與東協的關係似乎較難預期有突破性的進展。2008年1月7日，中星舉行首屆中國與新加坡防務政策對話。中共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與新加坡國防部常任秘書鄭子富共同主持了對話。會後雙方並簽訂首個國防交流與安全合作協定。儘管如此，東協關注的南海議題仍然無解。2008年，在南海的區域行為準則能否對所有的聲索國帶來某種經得起檢驗的具體結果？2007年年底在越南針對中國在南海行為的小規模示威，顯示對中國的戰略意圖仍有一些（小）程度的焦慮。

雖然日本作為區域中最大經濟強權，或許是對東協成員國最大的援助供應國以及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最大來源國之一，擁有不會引起嫉妒的地位，但卻被視為是一個區域的局外人。然而，自從2006年小泉純一郎（Junichiro Koizumi）卸任首相後，東協與日本的關係有一些進展。然而，小泉的接繼任者安倍晉三（Shinzo Abe）終究因在位時間過短的關係而沒有任何顯著的成就。他的確提議建立「東協與日本名人小組」（ASEAN-Japan Eminent Persons Group）為強化關係具體的計畫提供推薦與建議。該報告將在2008年公佈。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Yasuo Fukuda）與東協領導人已經進行過一次自在的首屆高峰會，他回憶了根據他父親命名受歡迎的「福田主義」（Fukuda doctrine）。東協與日本

自由貿易協定的地位將是 2008 年觀察雙邊關係的主要項目之一。

除了金大中 (Kim Dae Jung) 總統外，南韓並未被意識到在區域的外交 (六方會談的外部) 是積極的行為者。2007 年，東協與韓國的關係沒有任何重要的躍進，儘管 2007 年東協與南韓自由貿易協定 (ASEAN-South Korea FTA) 在服務業貿易的部分成功的談判視為一項政治的重要發展。然而，在商業的層次，許多報導指出韓國在東協投資的激增，尤其是在新興的柬埔寨、寮國、緬甸和越南 (CLMV) 等國。即將離職的總統盧武鉉 (Roh Moon-hyun) 曾經在新加坡召開的東協與韓國高峰會上建議成立一個「東協與南韓中心」(ASEAN-South Korea centre) 以協助強化關係。新當選的總統李明博 (Lee Myung-bak) 將為東協與韓國的關係帶來什麼仍有待觀察。

2007 年，東協與其他對話夥伴的關係並沒有重大的進展。東協與印度自由貿易協定 (ASEAN-India FTA, AIFTA) 在商品貿易部分的談判並沒有任何突破的進展。除非印度政府在自由化其貿易體制的保護立場有重大的改變，否則 2008 年東協與印度自由貿易協定不太可能有多少進展，儘管印度政府樂觀地認為雙邊協定在 2008 年上半年可能完成。

東協與澳洲的關係也是屬於平淡 (unexceptional)。新總理路克文 (Kevin Rudd) 在競選時承諾強化與「亞洲」的關係，但在澳洲的政治環境中，「亞洲」的關係更偏向澳洲與中國關係的傾向。

東協加三進程似乎在 2007 年也顯露動能不足。東協加三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 似乎已經推遲。多邊清邁倡議的討論變成不確定的情形。對涵蓋東協加三成員的東亞自由貿易協定 (East Asian FTA) 提議的研究仍在進行。2007 年的東亞高峰會並未提出任何重要的倡議。包括東協加三和東亞高峰會在 2008 年不太可能產生多大的作用。研究結論：

一、東亞高峰會的會員身分問題

(一) 會員身分問題由來已久

2004 年 11 月之後的整年，關於東亞高峰會的問題，最受關注的焦點不是高峰會的議程或目標而是其成員資格。回憶 1990 年代，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 (Mahathir Mohamed) 提議一個「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ing, EAEG)，其中包含九個東南亞國家以及中國、日本和南韓。其目標將是如果全球自由貿易談判失敗發生，得以具備對歐洲和北美

貿易集團的談判籌碼。然而，憂慮自身區域影響的下降，美國堅定反對該提議。雖然在 1993 年東協認可該計畫的稀釋轉型，稱為「東亞經濟核心會議」（East Asian Economic Caucus, EAEC），華盛頓及其主要的區域盟國日本和南韓持續反對一種「唯獨亞洲」的區域集團概念。反之，它們支持涵蓋更多的如「亞太經合會」論壇成員，其有唯獨亞洲之外的澳洲、加拿大、智利、墨西哥、紐西蘭、巴布亞紐幾內亞、秘魯、俄羅斯和台灣以及美國。自 1994 年開始，美國也參與安全取向的「東協區域論壇」。

（二）東亞區域意識加強

1997 年區域金融危機時期，一些東亞的政府感受它們被西方和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所遺棄，從而也助於區域認同感覺的具體化。同時，中國和日本也尋求與東協成員加強雙邊的對話。結果，東協國家和中國、日本以及南韓之間年度的「東協加三」對話被提升至高峰會層級。2001 年，在東協加三贊助下建立的「東亞展望小組」（East Asian Vision Group）提議建立一個「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的長期目標。在其他方面，小組建議東協加三應逐漸形成一個東亞高峰會。由於在國家大小和權力方面東亞國家有很大的差異，而且彼此之間仍有摩擦，建立任何種類有效的泛區域共同體將是一項具有高度雄心的任務。2002 年東協加三的「東亞研究小組」（East Asia Study Group）的報告表示，仍然認同東協加三應發展成一種東亞高峰會的概念，同時強調不需要超出東協加三成員的政治「安逸程度」，而且不強調一個區域共同體的目標。

（三）會員資格的角力與妥協

雖然 2004 年巴達維宣布首屆東亞高峰會將在 2005 年底舉行，但關於高峰會會員身分區域沒有達成一致，迄至 2005 年方逐漸明朗。北京希望限定東南亞和東北亞的國家（亦即既有的東協加三成員）參與，渴望在該區域論壇開始確立其影響力甚至優勢地位。但東京希望一種涵蓋更廣的團體，暗含其中中國的權力和影響將受到區域外利害關係者的存在而被抑制，最重要的是美國。儘管一些東南亞的政府，尤其是新加坡不公開的支持相同的立場，2005 年 4 月，東協設定三項參與的條件：不但作為全面的東協對話夥伴而且與東協有「實質」（substantive）的關係，潛在的高峰會成員也被要求簽署東協的《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TAC），其用以促進東南亞的和平與穩定，並且提供一種爭端和平解決的程序（從未使用）。類似的條件並未強加於區域主要的正式的安全團體東協區域論壇的

會員身分上。儘管《友好合作條約》實際上是一項政治而非法律的文件，美國和澳洲的政府顯然認為簽約國必須聲明在東南亞放棄武力的使用或威脅與它們的承諾有潛在的矛盾，在緊急狀態，對恐怖主義的先發制人（pre-emptive）軍事行動。

（四）澳洲以保留立場取得資格

澳洲仍然希望參與東亞高峰會，因為澳洲看到為增進其在包括經濟與安全範疇的利益上有潛在的重要性。2005年7月，坎培拉宣佈儘管仍有疑慮，但將簽署《友好合作條約》，並在2005年12月高峰會前夕澳洲簽署。同時，外交部長唐納（Alexander Downer）強調了四項「諒解」（有效的保留），亦即坎培拉與東協夥伴同意：簽定《友好合作條約》將不會影響坎培拉既有的安全安排（尤其與美國的同盟），澳洲在聯合國憲章下的權利與責任，或澳洲與東南亞之外的關係，而且唯有在獲得坎培拉邀請後，東協方能干預涉及澳洲的爭端。

（五）俄羅斯的資格在第三屆峰會仍未明朗

在簽署《友好合作條約》方面，澳洲加入了中國、印度、日本、紐西蘭和俄羅斯以及東協的成員。在東南亞區域外主要的行為者唯獨美國仍舊避免簽署《友好合作條約》，並從而無法取得東亞高峰會成員的資格。儘管美國關心由《友好合作條約》造成的可能限制，華盛頓或許也刻意選擇自身處於高峰會之外，在不確定東亞峰會潛在的效用以及是否其緊緊將複製美國已經涉入亞洲團體中的工作：在經濟領域的亞太經合會，以及在安全領域的東協區域論壇。直到東亞高峰會的角色和立場變得明確，華盛頓將同意簽署《友好合作條約》並取得高峰會參與的資格似乎不太可能。雖然俄羅斯聯邦是《友好合作條約》的簽約國，而且表現出加入東亞高峰會的興趣，但渠缺乏實質的角色而且其先前亦非是東協的對話夥伴，因此似乎不合格。然而，在首屆東亞高峰會之前不久召開首屆東協與俄羅斯高峰會，其中蒲亭（Vladimir Putin）總統出席做為馬來西亞的貴賓。

二、東亞高峰會實質的欠缺

（一）討論議題豐富但仍受限於成員國的信任程度

首屆高峰會召開之前，新加坡的智庫國防與戰略研究所（Institute of Defense and Strategic Studies）為高峰會提出30點的議程，目的在於提供東亞高峰會成員實質討論與鼓勵的框架，以進行區域範圍內的功能合作。就短期而言，在反恐、海洋安全和「衛生安全」（health security）的合作被提議，隨後在中期到長期則在經濟，尤其是一個「東亞自由貿易區」（East Asian Free

Trade Area) 的創立、能源、人類安全、跨國犯罪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合作。由於如此全面性議程，主要的問題是在區域中其他多邊的機制已經處理許多列出來的議題，其理論上涵蓋了幾乎得以檢驗區域合作的每一項議題，歐洲模式經濟整合和主權集聚 (sovereignty-pooling) 的缺乏。區域的國家也察覺到龐大的泛區域機制對經濟與安全合作通常不是最有效的渠道；從該類機構的政策產出傾向基於最小的公分母。在反恐合作的領域中十分明顯，其中有效的情報交換有賴於合作國家之間高度的信任(通常其僅能藉由雙邊成立)。

(二) 三屆峰會並未取得任何有效成果

甚至在首屆東亞高峰會召開之後，新高峰會或許增加其他區域對話努力的價值仍不明確。馬來西亞的主席巴達維以可以預料且平淡無味的用詞總結 12 月 14 日三小時的首屆會議，他引述參與者的「在區域和國際政治與經濟議題富有成效的意見交換」，而且它們一致同意在它們「和平、穩定與繁榮」的共同利益應置於區域的優先。雖然高峰會的確發布一項《預防、控制和應對禽流感東亞峰會宣言》(East Asia Summit Declaration on Avian Influenza Prevention, Control and Response) 的個別聲明，實質討論的缺乏由《東亞高峰會吉隆坡宣言》(Kuala Lumpur Declaration on the East Asia Summit) 中放諸四海皆然的語言所證明，除了確定東協將持續為高峰會的驅使力量以及會員身分的守門員外，宣言的重要性不高，而且未來高峰會將被「定期」(regularly) 召開(不必然每年一次)。

三、東亞共同體名實相符仍有漫漫長路

(一) 東亞共同體的範圍仍在角力

來自整個東亞領導人聚在一起的原本理由的絕大部分是為一種制度化的基礎做準備，包括經濟與安全面向的泛區域共同體。如此一個共同體的精確範圍，遑論其工作方法仍未界定。依據東亞高峰會，更大的關注已經在於共同體的潛在成員。儘管印度和日本仍然傾向利用東亞高峰會，但由於其廣泛的會員，作為一種共同體的基礎，一旦高峰會的成員身分包括各種非東亞國家，中國可能僅接受以東協加三作為區域共同體的基礎似乎十分明顯。中國偏好的模式主要是基於權力政治的原因，在東南亞可以發現一些同情，該等不苟同西方外交和安全政策，而且一種區域認同的自傲感自從 2001 年已經在一些國家獲得強化。

(二) 東亞共同體並非北京支配的平台

儘管首屆高峰會結束發布的《吉隆坡宣言》無法指出若有可能東亞高峰會在建立區域的

共同體可能扮演的角色，高峰會主席非正式談話指出，他不認為澳洲、印度及紐西蘭是該共同體未來的成員。然而在實踐層面而言，該等三國正逐漸與東亞整合而且擁有日本這個重要的東亞盟邦。它們的目標將主要是關心促進貿易和投資而加入區域的共同體，而且如同日本，它們將不願成為任何集團係由中國或許意圖利用作為區域支配的平台。關於擴展至東亞共同體的較大問題是，其成員包括或排除的界線為何，或許能在經濟和安全議題獲致重大的一致，因為現存諸如中國和日本，以及中國和印度等主要行為者之間組合的根本對抗。

（三）經濟利益即困難重重遑論價值共同體的建立

推定區域共同體的範圍和角色的爭論將被簡單或快速的解決似乎不太可能。而且是否東亞高峰會倡議將在建立該共同體扮演一個有效的角色，仍為一項有爭議的問題。因此，一般所言的東亞共同體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利益共同體」，而非全面的利益共同體。尤有進者，在利益方面上且如此，遑論價值方面，更難論斷東亞正在形成共同體。